

沈城百年相册 12

永清写真馆：沈阳第一家照相馆

□ 荆绍福

1901年春，日本人永清文次郎和俄国人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在今天的中街南、朝阳街东开办了永清写真馆（即照相馆），这是沈阳第一家照相馆。

永清写真馆的设立

永清文次郎，1869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柳川市。他15岁来到长崎市，师从于日本摄影界的鼻祖上野彦马，学习摄影技术，从事摄影工作。1894年，永清文次郎离开上野照相馆，先后在广岛市、柳川市、久留米市从事摄影工作。

在久留米市期间，他和摄影师、俄陆军上尉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相识并成为朋友。1900年春，他受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之邀，与其一同赴中国旅顺，在俄军旅顺要塞司令部摄影班工作。1900年11月，他又和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乘军用列车来到了奉天，在俄军奉天（沈阳）驻屯军司令部摄影班从事摄影工作。永清文次郎和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一起，在当时的奉天钟楼南大街，也就是今天的中街南、沈阳路北、朝阳街东，合办了永清写真馆。两年后，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回国，永清写真馆就由永清文次郎独自承办。

永清文次郎是第一个在奉天定居的日本人，他的写真馆也是当时奉天最早成立的唯一一家照相馆。

永清写真馆及其分店

永清写真馆店铺以及永清文次郎一家的住宅，从1901年到1934年撤离沈阳，一直位于钟楼南大街1-32，即今天的沈河区朝阳街和故宫东巷交汇处朝阳街东，占地面积大约为660平方米，其中一半是建筑面积。其他还有庭院、道路，地面全部铺有木砖。写真馆面向钟楼南边的大街即今朝阳街。店铺和住宅宽15米，进深7米，外边墙壁上贴砖涂浆，洋风平房。正门的旁边挂着刻有“奉天永清写真馆”的黄铜招牌。

1911年，在永清文次郎的援助下，永清文次郎的弟弟清藏在湖北省汉口市的法租界十三号开设了永清照相馆分店。

1912年，永清文次郎的哥哥淳一经营的永清写真馆铁岭分店在铁岭东大街开业。虽然名称是永清写真馆分店，但其实是完全独立的店。永清文次郎在分店开店之前、成立之后，不遗余力地给予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帮助。

1919年，永清写真馆富士町（今和平区南京街）分店，在富士町四番地的富士町大道与北边的一条大道相交叉的拐角处建设，即今天的南京街与北一马路交汇处东南角。永清写真馆富士町分店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平方米。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的两层建筑，部分三层建筑。



1921年南京街上的永清写真馆支店

正面的大门上有三角形的装饰。墙外面贴有白瓷砖，显得格外雅致。

第一层是店铺和住所，面向富士町大街（今南京街）的店铺设有陈列窗，地板是用木块拼起来的，居住的房间都是纯日本式的风格；第二层是摄影棚，把等候室的面积也算进去的话，大概有80平方米左右；第三层是面积比较小的厅，放着大规模的摄影装备。摄影棚是斜面式的，能够从北侧的窗户采光。整个屋顶的坡面与墙面的中间部分贴有玻璃。阳台位于建筑物的北、西两侧，在阳台正上方的墙面上能看见“永清写真馆”这五个字的浮雕。

虽然永清文次郎在新城区建设了富士町分店，但他自己却没有搬到新城区住。自从1900年来到奉天这片土地上之后，他就一直居住在城内。城内钟楼南大街的永清写真馆就成为永清写真馆的总店。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两年后，永清文次郎的侄子在长春（伪满时期称新京）新开了一家永清照相馆新京分店。

永清文次郎与张作霖

永清写真馆开业之初，名流云集，生意兴隆。作为一名出色的专业摄影师，永清文次郎热情主动地为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等高级官员服务，和奉天上层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永清文次郎和张作霖交往甚密。张作霖进入奉天出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后，不久便知道永清文次郎的存在，并且委任他为自己的专属照像师，张作霖成了

照相馆的贵宾，这是永清文次郎与张作霖的初次邂逅。

以后，永清文次郎就像张作霖的家庭成员一样，其亲密程度远超过单纯的专属照相师与顾客的关系，而且这种亲密交往持续不断。在永清写真馆陈列橱窗里，一直贴着张作霖的照片，照片上的张作霖胸前佩戴着闪亮的勋章，他的帽檐是立起来的，穿着军装的样子非常的威武。张作霖的照片与其他陈列着的样本照相比，明显要大出很多，而且照片是用金纸做的边。橱窗里还有张作霖与儿子学良、学铭一起拍的亲子照。

在奉天反日、抵制日货运动最激烈时，张作霖对永清写真馆始终给予特别保护，使其免于受到损害。1926年的某一天，奉天城内钟楼南大街的永清写真馆周围，大约有三十多个士兵拿上了刺刀的步枪，围堵在永清写真馆前。附近居住的市民和路过的人们纷纷围拢过来，以为张作霖派军队过来，是要接管这家日本人开的店。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张作霖派兵是来保护永清写真馆的。据说张作霖好像不止一次地对永清文次郎说过，“我是决不会让永清大人的店里发生被人投掷石头这种事情的，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

永清写真馆与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之一。他的前半生为记者，是明治中晚期日本新闻界

论界有名的“中国通”评论家。1907年，内藤湖南转任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成为京大中国学的学术带头人。他一生曾先后九次来中国进行社会考察、学术访问等，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报界人士等有过许多接触和交往，而访书更是其主要目的。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1912年的沈阳故宫满蒙文文献的拍摄。这次他是受京都大学委托专程赴奉天，拍摄故宫宫殿内珍藏的清朝史料的。内藤湖南从3月23日到5月17日，整整八个星期，都埋首在崇谟阁内进行紧张的拍摄工作，在京大文学部讲师富冈谦藏、羽田亨的协助下，共拍摄了一万张以上的胶片，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自从发现了《满文老档》等重要文献后，内藤湖南久存翻拍带回日本研究的念头，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地拍下了《满文老档》与《五体清文鉴》。

《满文老档》是清太祖努尔哈齐、太宗皇太极两朝历史的编年文献，共180册，记载1607年-1636年间满清开国史事，是研究满洲开发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可以说，

《五体清文鉴》，是清朝满、藏、蒙古、维吾尔、汉五大民族的文字辞书，由康熙敕修，乾隆年间陆续成书。最早是满、汉对照，后加入蒙文、藏文，最后加入维吾尔文，完善为《五体清文鉴》。此书只以抄本传世，藏于北京及奉天的宫殿中。此书按天文、地理、制度风俗等内容细分为35部，是包括清代全国许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方出产等多方面的辞书，既有语言学上的实用价值，又有历史研究上的文献价值。

关于这次拍摄，也颇有一番曲折。奉天宫殿对外国人调查先皇遗物，是采取谨慎态度的。内藤到达后，先是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与奉天都督赵尔巽交涉，内藤又私人出面，以多年前旧识的身份，送了赵尔巽和手下的孙外交官厚礼，这样公私夹击，才得以进入宫殿拍摄。他们还谎称只是拍摄文字书籍《五体清文鉴》，而实际上则是先秘密借出《满文老档》，当全部拍摄完《满文老档》的4300张胶片时，立即还掉此书，又借出《五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合计照片数有5300多张，两者照片总数达到9600多张（去除重拍的部分）。内藤湖南在所著《奉天访书谈》和《奉天访书记》中都无所顾忌地写下他于1912年在日本政府各方面支持下，使用向官员行贿的手段，偷拍奉天宫殿内贵重古本书的实情。

永清文次郎与来奉天的内藤湖南第一次见面，是在1905年8月11日。永清文次郎深感内藤湖南中国学的造诣之深和对研究的执着认真，而今其欣慰的是他的照相技术多少能够对于湖南的实地研究起到一些作用。

关于照片的拍摄和显影问题，在1905年和1912年，永清文次郎与内藤湖南进行了两次交流。内藤湖南拍摄的近万张照片的显影，在永清文次郎帮助下，在永清写真馆等照相馆完成。当时的奉天照相馆很少，仅有的几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中，永清文次郎的摄影技术水平是最高的，没有永清文次郎的帮助，内藤湖南的拍摄就会非常困难。可以说永清文次郎是内藤湖南使用卑劣手段拍摄沈阳故宫珍藏清朝史料的技术帮凶。

猎取沈阳故宫的满蒙文档案文书，是内藤湖南一生访书收书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日本中国学满蒙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事件。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宝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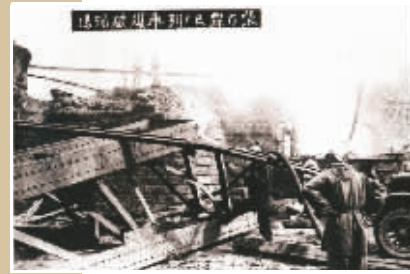
1929年12月28日，因为肺炎，永清文次郎在中国奉天日本红十字会奉天医院死亡，那年他61岁。永清文次郎逝世的第二年，满铁奉天附属地新市区内的富士町（今南京街）四号的永清写真馆富士町分店就关门闭店，据说是永清文次郎的儿子投资股市交易失败而倾家荡产。1933年雇佣中国人继续经营的城内钟楼南大街的永清写真馆总店也停业关门。1934年春，永清文次郎的儿孙们终于偃旗息鼓，从奉天返回了日本。永清写真馆在奉天成为历史。



1904年永清文次郎拍摄的奉天银器局（今沈阳通币有限公司）



1902年永清文次郎拍摄的盛京将军行署正门



1928年永清文次郎拍摄的张作霖被炸现场

内藤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最早注意到《满文老档》史料价值的学者。它被拍摄带回日本后，收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另有副本藏于日本满铁调查部白山黑水文库，对日本满洲史研究的建立、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感悟做人做事做官 知行八谈

作者：刘士欣 2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通过选拔使本单位最优秀的干部脱颖而出。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就是过分追求完美，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4）举荐干部要道长论短。韩愈《马说》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要树立开放的人才观，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对优秀人才不埋、不拦，积极向上举荐，而对其缺点和不足，也要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指出和介绍，以便上级了解考察、量才录用。

三是管制度。制度既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也包括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形成良好有序的善治，健全完善的制度是关键。二流的制度胜过一流的人才。要想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管事，正职就要带头遵规守纪，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邓小平同志指出：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四是管财务。一个单位，出不出政绩在思路，出不出问题在财务。正职管财务不是指具体的资金签批，而是指定好大盘，保运行、保稳定、保发展，保证财务收支遵章守纪、用好不出事。

五是管自己。“正人先正己。”正职首先要“修己”，然后才能“安人”。其一是要有担当。担当是一种责任、一种人格，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般铁肩担道义的气魄。其二是要有胸怀。面对功过，要有推功揽过的气度，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增强整个单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三是要有境界。要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全局，虚怀若谷，有“将军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容人雅量。其四是要有正气。正派、公道、无私，不仅要把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腿，还要管好身边的人，时时处处为人表率。

实践证明，搞坏一个单位，往往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够了；而搞好一个单位，必须正职与副职紧密配合、干群互助、同心协力。

副职五做到：

一是决策不越位。

遇到决策拍板的事，副职可以积极提建议，主动参谋，但绝不能逞能、显摆。

二是落实不缺位。当决议形成后，无论对决议持何种意见，副职都要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

绝不可因自己的好恶、喜怒影响决议的执行。很多时候，正职考虑问题往往站在全局，谋划长远；而副职则经常从自身分管工作考虑。所以，副职要有全局意识，积极贯彻落实集体决策，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把分管工作抓出成效。

三是干好分内事。每位副职都有自己的责任田，要明确哪是自己的田，哪是人家的地，自己的田种什么。不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地，也不能该种麦子却种豆。同时也要有补位意识，当正职有令时、同僚有求时、群众需要时、情况紧急时，挺身而出，及时补位。

四是当好正职的参谋助手。副职要有大局意识、团队精神和共建共享的理念。工作中不能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大家戮力配合，做好每一项工作，这个单位才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正如乌云遮住了阳光，万物生灵都逃不出乌云的阴影。同时，副职要胸怀大局，参谋到位。对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多搞调研，为正职的决策提出建议、提供依据。对决策执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头脑清醒、处理得当，如果发现决策确有偏差，要及时向正职和领导集体反映，提出解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五是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副职在协调与各方面关系的时候，应做到竖着一条线，横着大片。（节选完）

连载

编辑 盖云飞

责任编辑 于勤

电话 22690171

时任《诗潮》杂志主编李秀珊前来看望他，他吃力地说，他还有一组农民工的诗歌《我是瘦月亮》没有写完，只完成3首……他的眼中流露出遗憾。父亲去世后，我将这组诗交给编辑部刊发。这是父亲最后的绝笔。

父亲病重期间，我拼命地发疯般的想救他。我到长春去找“特药”，又跑到北京去请教名中医，还遍寻民间偏方……我竟然从北京背了20斤中药回沈。当我只身一人背着一大袋子中药奔向北京站过天桥时，在只剩几阶的时候摔了下来。没有人扶我，我坐在地上默默地流泪，我不觉得摔得痛，而是心痛，我心中明白，父亲他燃烧了半个多世纪的如诗般生命火焰就要熄灭了，留不住他了！

2008年9月21日，父亲他走了，在这个硕果累累的金秋9月。这一年，正是父亲从事文艺创作60周年。这个农民的儿子，走完了他歌唱的一生，就像他笔下的红高粱穗，沉甸甸的，弯下腰，伏下身，去亲吻大地母亲——回归了生他养他的黑土地。

告别仪式，用当时媒体报道的话说，这是一场充满诗意的告别。告别厅两侧的大幅黑色挽联最为醒目，这是父亲的家乡吉林省辽源市市委宣传部、辽源市文联撰写并送来的，嵌入了他的名字和作品名称。上面写着：先生离去文传万代迎宾曲 后者归来玉映千秋相马神 他的诗友、新老领导、辽沈文艺界名家、家乡亲朋、学生晚辈……数百人前来为他送行。我

和哥哥连夜精心编辑制作的《刘文玉生平》折页，还有沈阳日报、沈阳晚报关于父亲逝世的整版报道，被很多人收藏起来。他的诗友说：

情系黑土地，捧着一颗心来，

魂归关东山，不带半根草去步入告别厅的时候，响起的不是哀乐，是他创作的歌曲《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满载友谊去远航》。父亲他去远航了，满载着人世间的亲情友情和他钟爱的诗歌，“望大海，迎朝阳，万里金光……无论我走到哪里，祖国，您的嘱托，我牢记在心上！”在这熟悉奋进的旋律中，人们深深地怀念他。

著名诗人、原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和他夫人柯岩给沈阳市委宣传部发来唁电，唁电中说“刘文玉同志是杰出的人民诗人，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他一生为社会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逝世，不仅是辽宁省、也是全国诗歌界的难以弥补的损失。”

原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刘异云说：“文玉，人民的诗人；文玉，农民忠实勇敢的代言人；文玉，东北人民的好儿子。”著名诗人、《诗刊》主编叶延滨的唁电说：“文玉是个好人，好诗人，怀念他！”山东省著名诗人桑恒昌以10个字表达了他的心情：“向遥远的北方深深一躬”……

《生命在歌唱》是父亲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与体验。翻开这本诗集，看到他在后记中写到：“不管天阴晴，不管风雪暴，

父亲的歌

38

作者：刘禾

应为自己的信念歌唱。这是我的座右铭，只要生命不息，就要歌唱不止。”

生命在歌唱

——题鸟化石

总想飞向春天，不停地歌唱，不停地盘旋，寻觅、追求才是希望，这就是永恒的信念。

总想飞向远山，

歌唱碧水新绿，点缀人间，劳累的翅膀虽已飞酸，啼血也不会把初衷改变，飞翔的翅膀也不会收敛……

父亲啊，我知道，写作就是你的生命方式，你“劳累的翅膀虽已飞酸”，但是，你不肯停歇也不能停歇，就是“啼血也不会把初衷改变”，这是你的心声，是你生命的写照！那么，你就在碧水青山间永远歌唱吧！

（节选完）